

#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读《至暗时刻》

■刘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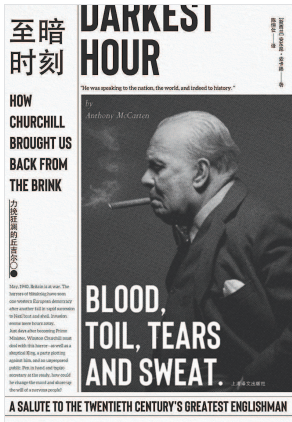
温斯顿·丘吉尔与罗斯福、斯大林无疑是二战同盟国的三大领袖。假如没有丘吉尔,英国在二战中的命运和历史很可能就会改写。他在纳粹的魔爪即将伸向英伦三岛的艰难时刻,临危受命,出任英国首相,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然而,历史的细节与真实远比那些高光时刻隐秘和复杂得多。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至暗时刻》《万世流芳》的编剧安东尼·麦卡滕的历史传记作品《至暗时刻》,抓取了二战中的一个关键时段,以 1940 年 5 月 9 日英国国会有关挪威事件的辩论至 1940 年 6 月 4 日敦刻尔克大撤退完成的一段激荡历史为中心,从相互抵牾的史料中再现了鲜为人知的丘吉尔与英国战时内阁的一段关于战与和、斗与降的博弈经历。麦卡滕独辟蹊径,从历史、心理、语言等角度,把“伟人”丘吉尔拉下神坛,既展现了丘吉尔在危急时刻运筹帷幄、果敢坚定的领袖品质,也如实地呈现他曾有过的犹疑和彷徨。尤其是丘吉尔在此期间两次逆转历史的恢弘演说,让读者一窥这位挽狂澜的领袖的领导能力与人格魅力。

1900 年 10 月,未满 36 岁的丘吉尔当选为国会下院议员。之后,在英国政坛摸爬滚打,反复锤

炼。一战中,担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由于决策失误,一意孤行,导致英国海军损失惨重,其把控战局的能力遭到新闻界与下院的猛烈抨击,他只得从海军大臣的岗位上灰溜溜地下台。然而,百折不挠、头脑清醒是丘吉尔难能可贵的品质。纳粹德国崛起之后,他是英国政坛少有的对纳粹的威胁和独裁本性予以揭露和批判的人。二战爆发之前,英国政坛的绥靖主义思潮蔓延,丘吉尔警告:如果任由德国肆意妄行,它觊觎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与罗马尼亚,只是早晚之事。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丘吉尔的预言具有惊人的准确性。

丘吉尔受命于危难时刻,于 1940 年 5 月 9 日在国会发表的第一次演讲,表达了与法西斯德国势不两立、战斗到底的决心——“动用我们全部能量,动用上帝所能给予我们的所有力量,对专制恶魔宣战,这个恶魔犯下了空前黑暗、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行”;他告诉同僚以及全体国民——“我所能奉献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与汗水”。如今,这篇演讲已被视为可与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相媲美,不过,当时它在国会的反应并不尽如人意。然而,英国的民众却对首相这篇激情洋溢的演说反响热烈,民心大振,《旗帜晚报》刊登了一幅颇具代表



《至暗时刻》  
[新西兰]安东尼·麦卡滕著  
陈恒仕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意义的漫画《全英国支持你,温斯顿》,就是最好的写照。

《至暗时刻》用相当的篇幅,钩沉了“我所能奉献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与汗水”的历史源流。丘吉尔的这段名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44 年西塞罗的著作《论占卜》、公元前 29 年李维的《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以及意大利近代独立运动的领袖加里波第在罗马圣彼得广场向被围困的士兵发表的鼓舞士气的演说,其中就有一段话:“我提供不了金钱,提供不了住所,也提供不了食品,我提供的只有饥饿、干渴、被逼无奈的

急行军、大大小小的战斗乃至死亡。”显然,丘吉尔从历史和前贤志士的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他从青少年时代就非常重视演讲的技巧和重要性,深得个中三昧。他曾在随笔中写道:“演说家是大众激情的具化。要能以情感感染大众,他自己先须情不可遏;要能激起大众的怒火,他自己先须怒火填膺;若能让大众感动流泪,他自己先须涕泗交流;要说服大众,他自己先须坚信不疑。”坚定的信念加上几十年的精研勤习,才成就了反法西斯战争中这篇激荡人心的演说。

《至暗时刻》围绕丘吉尔扭转英国二战历史的两次重要演说,浓墨重彩,运用各种史料还原了丘吉尔在这一历史时刻复杂的心路历程。纳粹德国挑起二战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打败波兰,轻取荷兰、比利时,绕过法国人花费了 700 亿法郎修筑的马其诺防线,攻进法兰西。此时,英国的 30 多万远征军被迫退到敦刻尔克,岌岌可危;法国的雷诺政府面对战局的失利一筹莫展,悲观失望,任凭丘吉尔反复加油打气也无济于事;而丘吉尔出任首相不久,相位并不稳固,战时内阁矛盾重重,与希特勒签订慕尼黑协议、因推行绥靖主义政策失败而下台的张伯伦并未离开内阁,他

与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是主和派的代表,不断地向丘吉尔施加压力。黑云压城,战局严峻,丘吉尔产生了动摇,授权哈利法克斯与意大利驻英大使会谈,希望通过墨索里尼斡旋,促成英国与希特勒的议和,哪怕以损失英国的部分海外领地为代价也在所不惜。尽管这些让相信丘吉尔在二战中从未动摇的人们非常忌讳和反感,但该书作者却以史料证明它曾真实地存在过,而这无损于丘吉尔的伟大,因为在历史的重要关头,他毕竟战胜了犹豫和彷徨,做出了正确的抉择,开始实施解救英国远征军的“发电机计划”,于是,就有了震惊世界的敦刻尔克撤退的大功告成,33 万名英国远征军将士奇迹般的获救;也有了丘吉尔于“发电机计划”宣告成功之后在国会下院发表的那次振聋发聩的演说——“我们将不惜代价守卫我们的岛国。我们将在任何一块滩涂战斗,我们将在任何一处敌人登陆之地战斗,我们将在任何一畦田野战斗,任何一条街巷战斗,我们将在任何一座山岗战斗,我们绝不投降……”

正如该书作者所言,丘吉尔“说出经质疑淬炼而得的坚定话语,选择实该选择的历史正道”。诚哉斯言!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 一项显示文学资料学实绩的成果

——评《中国现代作家佚文佚简考释》

■殷国明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曾经是人文科学研究中的显学,也曾取得过多种具有创新意识和学术价值的成果,但是若干年来,却似乎显得有些疲软和沉寂,遭遇了某种所谓“瓶颈”状态。究其原因,资料方面的贫乏和不足当是显著短板,这不仅表现在宏观的整体文学状态方面,例如对于现代文学创作状态的了解就明显不足;还表现在对于作家作品创作之外的边缘性、周边性、交谊性等与日常生活相关资料的收集和发掘,由此形成了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中的诸多空缺和盲点,自然也不能不影响到现代文学研究的质量和进展,致使研究者对于作家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和创作状态的分析和把握不够真实和精准,甚至出现“一概而论”“远离现场”的误读和误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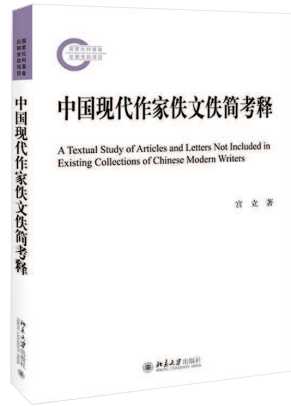
而这种状态近来有了转机的迹象,比如宫立博士最近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结项书稿《中国现代作家佚文佚简考释》,堪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学方面的一大收获,在很多方面弥补了不足和遗憾。这项成果涉及周作人、李劫人、周瘦鹃、郁达夫、梁实秋、沈从文、张恨水、郑振铎、夏衍、胡风、聂绀弩、李健吾、钱锺书、何其芳、徐芳、陈敬容、穆旦、黄裳、汪曾祺、李蕤、张元济、蔡元培、陈望

道、洪深、袁昌英、田汉、熊佛西、梁实秋、巴金、朱湘、李霁野、于伶、萧军、吴组缃、赵家璧、曹禺等数十位作家,他们中间有的是现代知名作家,有的则是尚未被研究界关注和重视,但实属为现代文学作出过贡献、发生过重要关联的文化人,他们的佚文佚简散布在报刊书籍的各个角落,以往一直未被发现和注意,而宫立博士不辞辛苦,锲而不舍,把它们从历史尘封中一一检出,并加以认真考释和解读,确实为相关研究和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资料和资源,不仅功德无量,而且补足了很多空白,解答了许多问题,进一步拓展了现代文学研究空间。

例如,在《新发现的郁达夫的题诗、佚简与演讲文稿》一文中,宫立从郁达夫 1929 年 10 月 1 日日记中提到的“作书一封寄陈伯年”说起,详言钩沉了于 1929 年 9 月 19 日日记中提到的给周作人的覆函之内容,信中郁达夫表达了自己当时在文坛所遭受的各种伤害和攻击,对于研究郁达夫在这一时期的生活境遇、创作状态和思想变化,都有切实意义。以往的研究有时过度夸大了个人爱情因素的影响,反而忽视了郁达夫当时所面临的文学困境,因为信中说“关于我个人的事情,是一件奇怪不可思议的谣言。上海的各小报及文

坛,都在说我已应了北京燕京大学之聘,去作署名文学系的主任了。并且薪水数目也有,到校的日期也已经有过,弄得大家来问我究竟,我倒反如张天师着了鬼谜,瞠目不能答对,你说这种谣言奇怪不奇怪呢?大约此事的出处,是由革文家等制造出来,意思是在(一)说我拜倒在美国拜金主义之下,(二)说我的确是小资产或有产阶级,每月收入有几多几多,所以是反动的代表。这一种中伤诬蔑,实在是可笑得很,但是中国人却专喜欢弄这些小玩意儿,那也是没有办法的。”

除此,此项成果还有一点值得称道,就是在对于佚文佚简的考释中,亦不失对于当下文学研究状态的思考。宫立是陈子善教授的高足,深得“让资料说话”的神韵,但是在资料考释过程中也会融入自己的感悟和理解。例如,在《周作人集外文拾遗略说》中,宫立对周作人《新文学的意义》一文进行了详细考释,认为此应为周作人两次演讲的“重录”,并对于前后几次演讲中的相关话语进行了对比,指出了它们的相同点和相异处。与此同时,宫立在引录周作人在 1922 年 5 月 30 日在北京女高师学生自治会的演讲《女子与文学》所说“文学是人生的或一形式的实现,不适生活的附属工具,用以教训或消遣的;



《中国现代作家佚文佚简考释》  
宫立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他以自己表现为本体,以感染他人作为作用,他的效用以个人为本位,以人类为范围”;“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于我们,当作一种专门的研究以外,还有很重要的意义与密切的关系,因为表现自己和理解他人,在我们的现代生活里是极重要的一部分”之后,即有感而发地写道:“这句话对我们当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也不无启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不应只是一门死学问,还应关注现当代研究的当代性,关注文学与当下生活、社会的关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应注重研究者个人的生命体验,毕竟文学(包括文学研究)是表现自己和理解他人的,都是‘在我们的现代生活里是极重要的一部分’”。

此类对于读者富有启发的、短暂的感悟之语,在书稿中还有很多,不仅表现了宫立在考释中的思考和发现,形成了文中连续不断的亮点,照亮了资料中的思想和意义,而且也体现了他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和追寻。由此也足以显示这项成果独特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